



叶梦得与苏轼

潘殊闲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叶梦得与苏轼

潘殊闲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梦得与苏轼 / 潘殊闲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3
ISBN 978-7-80752-316-1

I. 叶… II. 潘… III. ①叶梦得 (1077~1148) — 人物研究②苏轼 (1036~1101) — 人物研究 IV. K825.6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9978 号

叶梦得与苏轼

潘殊闲 著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028) 85011398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1.625

字 数 28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316-1

定 价 2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一个画家在艺术中

张志烈

：景忠三第

读到潘殊闲先生这本《叶梦得与苏轼》，我立刻想到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过的一些话。《艺术哲学》第一编第一章《艺术品的本质》中，对认识艺术品和艺术家，提出了“三步走”的办法。

第一步是：一件艺术品，无论是一幅画，一出悲剧，一座雕像，显而易见属于一个总体，就是说属于作者的全部作品。

第二步是：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例如莎士比亚，初看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迹，从别个星球上来的陨石，但在他的周围，我们发现十来个优秀的剧作家……在画家方面，卢本斯好像也是独一无二的人物，前无师承，后无来者。但只要到比利时去参观根特、布鲁塞尔、布鲁日、圣凡尔斯各地的教堂，就发觉有整批画家的才具都和卢本斯相

仿……到了今日，他们同时代的大宗师的荣名似乎把他们湮没了；但要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的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

第三步是：

这个艺术家庭本身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

对于宋代文化和文学来说，苏轼确实如丹纳所说的，“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是“最显赫的一个代表”。苏轼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迹”，也不是“从别个星球上来的陨石”，而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他是前有师承，后有来者的。在他的声音之下，有无穷无尽的“四周齐声合唱”的“一片和声”，而叶梦得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星。从其平生创作之丰富，作品流播之广远，读者之众多，研究争论之热烈以及对后世人文精神影响之巨大看，他都有着独特的光芒。就“文化”而言，他广涉各个领域，是个有很多专长的学者。从哲学、政治学、艺术理论到医药学、水利学，甚至在盆景制作、园林设计、自来水装

置、制墨、酿酒、烹饪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研究。就“文学艺术”而言，他是少有的多能文艺大师。其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巨擘，其诗为宋调最杰出的代表，书法、绘画俱臻上乘。其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卓越的人格魅力，成为历史上文化人敬仰的典范、倾慕的楷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宋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孕育并造就了苏轼的伟大，而苏轼在各方面的创新贡献又给予中华历史文化以巨大、深沉而久远的影响。苏海汪洋，确可谓“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正唯其如此，更加激励起学者们探索钻研的斗志。苏轼的精神世界无比广阔丰厚，但自有其核心价值观存在。研究苏轼的全部著作和其立身行事，我们可以大致看到贯穿他全部意识形态中最根本、最基础的东西，简略言之，即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我以为这些就是苏轼毕生坚持、维护的最高价值追求和生活信念。持此以观苏轼的著作，基本上可以处处皆通。

认识和研究是无限的，理解和阐释是永恒开放的、变动的、创新的。学者可以从无穷多的角度去观照自己的探究对象。殊闲先生这本书的写法，使我对丹纳所讲的“和声”的比喻似乎更体会到了一点东西。乐谱上标示的和声音符，如果单独奏出来，只能算是一些节奏似的响声，只有当它们和主旋律同时奏鸣时，才能展现出意韵无穷的音乐世界，才是真正的活的乐曲。认识文化生态，似乎也是这个道理。本书从政治实践、文学活动、学术兴味、生活旨趣几方面比较了苏轼和叶梦得各自的特点及其相互

关系，又从叶梦得与苏轼后人、叶梦得与晁氏家族、叶梦得与苏门及其追随者和友人几方面的联系影响进行考察，从而得出结论——叶梦得是窥探“宋代苏轼文化现象”与“宋人苏轼心理情结”的重要窗口。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路数，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和声”似的展现了当时文化生态的诸多关联和内蕴，加深了我们对苏轼和叶梦得两人的理解，这是别的写法所不能代替的。

此书还有一个特点是资料翔实，所言处处皆细致有据，启迪人作更远的思考。

比如第八章谈到叶梦得由于其特别的文化生活环境，故能“绍承了苏轼之余韵，开启一代之新风，成为一个与苏轼类似的在多方面都有一定影响和建树的复合型人才”。“宋代文人中博通型的多面手是很多的，像叶梦得这样的‘杂家’也不在少数。而苏轼无疑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这里讲到苏轼、叶梦得及宋代许多人的“复合型”与“博通型”的特点，就很值得注意。

追求“打通”，正是宋代文化学术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人类的任何文化创造之间，都含蕴着“共性”和“打通”的契机，这是由人的生活环境的一致性、相通性所决定的。首先，人类的生态具有一致性。生物进化赋予人类的肢体结构、身心功能及其基本欲求、生存方式是一致的。其二，人与客观世界的对象性关系及其开展实践活动具有一致性。人处在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与已有文化、与历史进程的对象性关系中，面临这一切进行着生存实践活动。其三，人具有既

作为个体又作为类群的存在物的一致性。人的类本质决定了生活实践面临共同的问题需要解决。其四，古今中外人类生活的共性决定了人类心灵深处有着共同祈向，从根本上说，即无不追求与自然的和谐，无不追求情感与理性的和谐，无不追求个体与类的和谐，无不追求历史与伦理的一致，亦无不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这四点内在地决定了人们的文化创造之间总具有“公因子”，总存在“打通”的可能性。

从特殊意义上讲，宋代文化发展之间的各种条件（也可看作是一般条件在宋代的显现）造就和促成了这种“打通”局面的形成。宋人是自觉的“打通”追求者。略为思索宋代文化诸现象如理学的出现，对此便可意会。苏轼在《祭龙井辩才文》中抒写了他的“打通意识”：

呜呼！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虽大法师，自戒定通。律无持破，垢净皆空。讲无辩讷，事理皆融。如不动山，如常撞钟。如一月水，如万窍风。

这就是苏轼在自觉而明确地追求“打通”。无独有偶，连被称为醇儒的司马光，也写了《解禅偈六首》：

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铍锋。终朝长戚戚，是名阿鼻狱。
颜回安陋巷，孟轲养浩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国。
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蛮貊。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
言为百代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坏身。
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光明藏。

道德修一身，功德被万物。为贤为大圣，是名佛菩萨。司马光的本意是说明佛学的那些所谓精言微义并没有超出我们儒学的深广范围，而其表达方式则鲜明地体现了“打通”型思维。至于叶梦得之能“通”于苏轼，除了上述人类的一般条件、宋代的特殊条件之外，还有他作为个体的微观具体条件。本书后四章就特别详细清晰地考论了这些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也是“打通”思维的产物。殊闲治宋代文史有年，扎实细密，眼界开阔，循此以往，当在这一领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此书行将出版，殊闲要我写几句话。我仅就一时感触说了上述肤浅的想法，不当之处，还祈读者正之。

己丑人日浣花溪畔

(72)	叶梦得《书》	三
(82)	叶梦得《书》	四
(92)	叶梦得《书》	五
(98)	叶梦得《书》	六

目 录

序	张志烈	(1)
---	-----	-------

第一章 叶梦得的政治实践与苏轼影响 (1)

一、忠谏敢言，痛击时弊	(3)
二、关心民瘼，为民谋利	(9)
三、忠于职守，造福当地	(18)

第二章 叶梦得的文学活动与苏轼风尚 (25)

一、文人雅集，文坛盟主	(25)
二、奖掖后进，乐做人梯	(33)
三、文学为戏，戏为文学	(39)

第三章 叶梦得的学术兴味与苏轼追求 (50)

一、易学之说	(51)
二、《尚书》之传	(55)

三、《论语》之释	(57)
四、老庄之学	(58)
五、佛禅意趣	(67)
六、诗学渊源	(78)
 第四章 叶梦得的生活旨趣与景苏情结	(88)
一、酿酒之乐	(89)
二、竹逸松韵	(96)
三、嗜石兴味	(106)
四、琴中之趣	(115)
五、养生之道	(124)
六、文房四宝与书画之爱	(133)
七、怡情山水与营造之乐	(143)
 第五章 叶梦得与苏轼后人	(154)
一、文学活动	(154)
二、其他交往	(165)
 第六章 叶梦得与晁氏家族	(174)
一、晁氏祖辈	(175)
二、晁氏父辈	(178)
三、晁氏同辈	(190)

第七章 叶梦得与苏门及其追随者和友人	(193)
一、苏门四学士	(194)
二、苏门六君子	(201)
三、苏门后四学士	(205)
四、蜀中乡友	(207)
五、其他友人	(216)
 第八章 叶梦得：窥探“宋代苏轼文化现象”和“宋人苏轼心理情结”的重要窗口	 (301)
一、宋代苏轼文化现象	(302)
二、宋人苏轼心理情结	(316)
三、南渡耆宿叶梦得与苏轼	(345)
 后 记	 (352)
主要参考文献	(354)



第一章 叶梦得的政治实践 与苏轼影响

苏轼不仅是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他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①，怀揣着“致君尧舜”^②的理想和“微官敢有济时心”^③的抱负，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后来在回忆自己的那种豪情壮志时，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④由于直言敢谏，见义勇为，他屡被权贵诋毁中伤，一生频遭贬谪。但这些磨难并未消磨其意志品质，

①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苏辙集》，陈宏天、高秀芳点校，第1117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以下所引，如未特别说明，均据此版本。

② 苏轼《戏子由》，[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卷七，第32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以下所引，如未特别说明，均据此版本。

③ 苏轼《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二首》之二，《苏轼诗集》卷六，第275页。

④ 苏轼《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第134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以下所引，如未特别说明，均据此版本。

他所到之处均恪尽职守，为国为君为民鞠躬尽瘁，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事迹，被人们传颂褒扬，以至于在民间有“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生作祠以报”^①的崇高礼遇。

叶梦得出生的时候，苏轼已经四十二岁，早已是驰骋文坛、政坛的风云人物，加之叶梦得的母舅晁补之系苏门四学士之一，外祖父以及其他晁氏舅系也大都与苏轼善交，因此，叶梦得可以说是在苏轼的名人光环照耀下成长的，苏轼成为了他的人生偶像。尽管叶梦得在历史上有所谓参与定元祐党籍的传闻和“阴抑元祐”的诟病^②，但无庸讳言，作为与苏轼后人、门人和追随者有诸多学缘、血缘和情缘等关系的人，叶梦得事实上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苏轼的影子里。换言之，叶梦得在许多方面与苏轼具有趋同性。譬如，在政治实践上，两人虽然生活的时代不同，政治实践的具体内容不同，但两人可以比较的地方还真不少。陈振孙说叶梦得“平生所历州镇，皆有能声”^③。从现存各种文献的记录看，此非虚言。下面试对苏轼、叶梦得两人政治实践的趋同性作一概述。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第8647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以下所引，如未特别说明，均据此版本。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第8647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以下所引，如未特别说明，均据此版本。

② 参见潘殊闲《叶梦得研究》第二章“叶梦得与北宋新旧党争”，巴蜀书社，2007年版。以下所引，如未特别说明，均据此版本。

③ [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著录《石林总集》评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一、忠谏敢言，痛击时弊

苏轼不仅进士及第，还考中了“制科”中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且入三等（宋代最高等），这种身份决定了苏轼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纠偏补弊的政治意识。苏轼在一篇文章中曾明确提出过“言必中当世之过”的理论：

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晁绛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其后二十余年，先君既没，而其言存。士之为文者，莫不超然出于形器之表，微言高论，既已鄙陋汉、唐，而其反复论难，正言不讳，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贵矣^①。

这篇文章提出了“言必中当世之过”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理论意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作家及其文章应该干预生活，干预政治，敢于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错误、缺点进行批评、揭露，以有益于国家、社会、民生。正是因为坚持这样

^① 苏轼《晁绛先生诗集叙》，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第31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以下所引，如未特别说明，均据此版本。

的政治理念，所以，苏轼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政治勇气。这不仅使他遭到新党的排挤打击，旧党也没有放过他。为此，苏轼可以说受尽了挫折。他也有不再写诗作文讥诮时政的懊悔，但最终还是没有这样做。对此，陆游可谓深得其心：“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忠臣烈士，所当取法也。”^①

综观苏轼的一生，确是以忠谏为砥砺，敢于处“盛世”而作“危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王安石掌权时决意变法，苏轼明知自己“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但是，他“不忍欺天负心”，于是“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以致得罪下狱^②。司马光上台后，不顾一切尽废新法，苏轼此时从一贬再贬中骤迁回京，做了大官，可是由于他从各地民间实践中亲眼看到新法的某些方面比旧法利多弊少，因而对新法采取了有所维护的态度，认为原来“交契最厚”的司马光一些极端做法又成了“当世之过”，且不惜与之力争，惹得司马光大怒，终于再被旧党排斥出去。苏轼曾坦言：“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③ 这里的“荆”指荆公王安石，“温”指温公司马光。苏轼不愿做没有操守和原则的“随风倒”，哪怕在关系身家性命的

① 陆游《跋东坡帖》，[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九，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苏轼文集》卷三十二，第912页。

③ 苏轼《与杨元素》，《苏轼文集》卷五十五，第1655页。

大是大非问题上，也一点不含糊。苏轼对自己的这种信念非常坚定。他有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话：

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①。

这真是对苏轼自我的形象刻画。多少年后，其弟在撰亡兄的《墓志铭》中有这样的概述：

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从而媒孽之……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②。

结合苏轼的自言和人生仕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苏辙的粉饰和虚誉，而是实录。因为苏轼自己在送呈皇帝的札子中就这样坦诚“交待”过：“臣愚蠢无状，常不自揆，窃怀忧国爱民之意，自为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然受性于天，不能

^① 苏轼《思堂记》，《苏轼文集》卷十一，第363页。

^②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苏辙集》，第1120、1127页。